

人
与
自
然
旅
行
家
系
列

马可·波罗

吴格言

makeboluomakeboluomak
makeboluomak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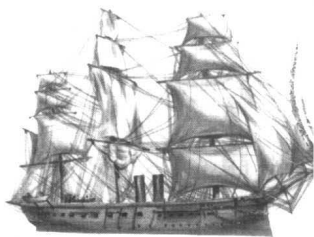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

马可·波罗

吴格言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可·波罗/吴格言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1999

(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)

ISBN 7-80611-813-6

I. 马… II. 吴… III. 马可·波罗 (1254~1324)
—生平事迹 IV. K835.468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9939 号

马可·波罗

吴格言 著

责任编辑: 梁东方

装帧设计: 王延强

美术编辑: 李文章

责任校对: 李桂香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)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(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9.875 印张 238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

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5,000 定价: 13.00 元

ISBN 7-80611-813-6/I · 730

序 言

马可·波罗(1254~1324)是十三世纪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。

1271年的时候,年仅十七岁的马可·波罗,跟随父亲尼柯洛和叔叔马窦,从故乡威尼斯出发,踏上了去往神秘而遥远的东方世界的路程。

他们原想从霍尔木兹乘船,从海路直航中国,但是,在发现了那里的船只质量很差以后,改变了原来的计划,作出了走陆路的决定。

他们穿过波斯,越过中亚沙漠,翻过帕米尔高原,沿着古老的横跨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的南线,一直东行,终于到达了大元帝国。

这一路,花去了他们三年多的时间。这个

时间大大出乎马可·波罗的意料之外。

当他们再次回到故乡威尼斯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了。

马可·波罗在中国住了十七年，并在当时的政府中担任官职。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，因为，蒙古帝国在那时是世界性的，政府的组成，也具有国际化的特点，像马可·波罗那样的色目人，在政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
完全陌生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，激发起马可·波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求知欲。他全面细致的观察和真实生动的叙述，使他在完成各项使命的同时，还适应和满足了元世祖忽必烈足不出户知天下的要求。

这两位身份、地位、年龄、文化背景等方面都大相径庭的人，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的兴趣和爱好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这友情一直持续到马可·波罗离开中国。

在许多年以后，马可·波罗向鲁斯梯谦口述自己经历的时候，仍然充满着对忽必烈真诚的敬仰和怀念。

据马可·波罗自己讲，忽必烈经常把那些最遥远、最有趣的使命交给他，这样，他就获得了比别人更多的机会，去观察和了解辽阔和神秘的中国。

马可·波罗作为商人家族的一员，从父亲和叔叔那里继承了良好的品质。他每到一个地方，特别关注该地的物产资源、商业行情和风俗习惯。这些情况，对于作为皇帝的忽必烈来说，也是正好需要，而且尤其宝贵的。

因此，马可·波罗大得忽必烈的信任与宠爱，甚至引起了其他官员的嫉妒。

随着岁月的推移，年龄的增长，波罗一家的故国之思越来越强烈。

忽必烈却不愿意让他们离开自己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

1291年，伊利可汗阿鲁浑向忽必烈请婚。1292年夏，忽必烈以阔阔真为妃，派马可·波罗与伊利汗国的使者兀剌台、阿卜思哈与火者等六百余人，分乘十四艘帆船，从福建的泉州港出发，用了两年多的时间，经过苏门答腊、爪哇、印度等地，平安抵达波斯，完成了皇帝交给的使命。

这时，他们得到了忽必烈去世的消息。重回中国的幻想破灭了。

波罗一行从波斯继续北行，到达土耳其东部，从黑海的特拉布宗港口乘船，前往君士坦丁堡，从那里走海路，在1295年的冬天，回到了阔别二十五年的威尼斯。

少小离家老大归。

当这三位风尘仆仆、衣衫褴褛的老人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，居然被已不认识自己的亲友拒之门外。于是，他们撕开外面的衣服，露出里面的金银珠宝，拿出人证物证，才走进了自己的家门。

那时，威尼斯与热那亚为了争夺对地中海的控制权，经常发生战争。

1298年9月7日，在柯祖拉岛附近的一次海战中，威尼斯人战败了。

马可·波罗作为一名囚犯，被投入了热那亚的监狱。在那里，他遇到了比萨作家鲁斯梯谦。

用法语写了一些关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浪漫故事的鲁斯梯谦，已经初有名声。

但是，真正使他流传百世、得以不朽的，是由他笔录、马可·波罗口述的《寰宇记》。

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

现在，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马可·波罗口述时候的动机。也许，

为了消磨单调而困苦的狱中生活，在不经意的闲谈中，鲁斯梯谦发现了一个宝贵的题材。

马可·波罗在热那亚的监狱里，只呆了不到一年的时间。

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，他和鲁斯梯谦一起，完成了一部对后来东西方交通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。

马可·波罗出狱以后，继续经商。后来，他和一位威尼斯的上层妇女多纳塔·巴杜尔结了婚，生了三个女儿：范蒂纳、巴丽拉和莫雷塔。马可·波罗在后来的遗书中说，他的三个女儿，结婚后共生了六个孩子：四女两男。

1324年1月9日，马可·波罗在威尼斯去世，被安葬在圣·劳伦佐大教堂的墓地里。

十四世纪的作家达奎·雅各布说，马可·波罗临终前，他的孩子们劝他承认编造了并取消书中那些不同寻常、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。马可·波罗却说：“我还没有讲出自己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一半。”

二

无疑，马可·波罗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旅行家。他的《游记》，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新的天地——遥远神秘的东方世界，大大扩展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。

直到近代，马可·波罗的口述，始终是欧洲人了解亚洲情况的第一来源。

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，《马可·波罗寰宇记》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出版。

这部书从十六世纪以来，就不曾停止过印刷。

当然，所有这些，并不是说，马可·波罗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、

后来者的道路，也不是说，他的口述是完美无瑕，无可挑剔的。

事实上，早在公元前 334 年，二十二岁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曾统率大军东征，一直打到印度。人们传说，这位不知疲倦、勇往直前的君主，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可以征服的地方，竟然坐在印度河边哭了。在返回的时候，他自己率军越过伊朗和阿富汗的沙漠，命令克里亚特人尼尔丘斯带人乘船，从海路返回波斯。

公元前 324 年，亚历山大和尼尔丘斯在两河河口处的苏萨会师了。

陆路方面。从公元前 139 年起，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，张骞奉汉武帝之命，几次穿越中亚，打开了东西方交往的大门。

到公元二世纪的时候，地中海的商人们由于担心海路漫长危险，代价昂贵，开辟了从地中海东部出发、穿越中亚、到达中国的漫长商路。由于珍贵的中国丝绸是当时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主要推动力，人们称这条商路为丝绸之路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丝绸之路并非一条单一的线路。其中，北线是从拜占庭北部出发，经过顿河、伏尔加河、俄罗斯草原、巴尔喀什湖北部，以及西伯利亚南部，到达阿尔泰山南部的准噶尔地区，与南线汇合。

和更多的旅行者一样，马可·波罗一行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线：从地中海沿岸出发，经过美索不达米亚平原，到达中亚的门户巴尔克。位于帕米尔和兴都库什两山之间的巴尔克，是丝绸之路上所有旅行者聚会活动的中心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商人，都把巴尔克作为自己行程的终点站。

从巴尔克出发，既可以向东北行进，穿过布哈拉、撒马尔罕、塔什干和康居这些沙漠上的绿洲，到费尔干纳，再沿天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向东，到达当时中国最西部的城市：敦煌和安西。

另外一条线路在南边：从巴尔克向东，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

南部边缘,经过喀什噶尔、亚罕、和田和沙昌,由敦煌和安西进入中国内陆。

丝绸之路不但有如上所述的東西方向的线路,而且还包括几条南北方向的路段。许多商人和旅行者从巴尔克出发,向东南穿过喀布尔和尼泊尔山口,到达印度的西部。

中国的汉族人和藏族人,经常从安西向南,穿越西藏高原,先到拉萨,然后翻越喜马拉雅山,进入印度的东部和缅甸。

这样,丝绸之路就把亚洲和欧洲联系起来了。

由于商业贸易带来的巨大利益,漫长的丝绸之路的不同地段关口,被不同种族所控制着:中国人控制东段,罗马人或波斯人控制西段,中间一段则掌握在中亚本地人手里。

虽然丝绸之路的东端一直非常兴旺,但是,从公元三世纪之后,西端的活动就萧条了,并且随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急剧衰落。

公元七世纪时,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半岛上崛起,控制了从君士坦丁堡到中国之间的大段丝绸之路,在亚、欧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。

由于伊斯兰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战争,依赖和平交通的商业贸易往来,除了衰落以外,别无选择。

1095年,十字军东征,欧洲人在西亚获得了一块立足之地,丝绸之路西端的贸易才有了一线生机。

十三世纪,蒙古帝国兴起,控制了贯穿亚欧大陆的整条丝绸之路。从忽必烈统治时期起,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,为东西方商业贸易的和平往来,提供了一个安全有利的环境。

马可·波罗一行,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国际和平环境下,沿着丝绸之路的陆路的南线,来到了中国,又由海路回到了威尼斯。

在商业贸易往来进行的同时,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随之展开。来自不同地方和种族的商人们,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,也在传播着

不同的语言、宗教和风俗。文化交流对后来世界的深远影响，丝毫不亚于商业交易。

总之，在马可·波罗之前，许多人已经在丝绸之路上来往；五世纪时中国的高僧法显，七世纪时的玄奘，尽管他们所走的方向正好与马可·波罗相反，但是大部分线路却完全相同。

在欧洲，第一个穿越亚洲、揭开西方人到东方旅行新时代的人，是罗马天主教方济格会的修道士卡尔皮尼。作为教皇英纳森四世的特使，他在1245年4月的复活节，和另外两名修道士斯蒂芬、本尼迪克特一起，出使蒙古帝国。1247年，卡尔皮尼回到苾轮，出版了《蒙古史》，第一次描述了蒙古的游牧部落生活，全面记载了蒙古帝国和中亚地区的地理、气候、历史、宗教和风俗，以及被蒙古人征服的民族和国家。

1253年5月，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格会的修道士威廉·鲁布鲁克等人出使蒙古，带回了比卡尔皮尼更为详尽的关于当时中国情况的报告。

因此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马可·波罗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。他没有任何新的地理发现，也没有开辟新的通向亚洲大陆的路线。

事实上，马可·波罗一行所走的，是联结欧亚大陆的最好走的一条线路。

但是，“发现”总是相对而言的；存在先于意识，除了人们从未涉足的地区以外，没有什么真正的发现。

用新的地理发现要求马可·波罗，对他来说，是非常不公平、也是不尽人情的。

马可·波罗的杰出贡献，在于他体现了笛卡尔的那句名言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

它具有探险者最可宝贵的品质：永不满足的好奇心，如饥似渴

的求知欲,和细致入微的洞察力。因此,他看到了人们不曾看到、或者说是视而不见的事物。

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现,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物质层面,而是深刻地理解曾经去过的地方,以及耳闻目睹的一切。

所以,任何旅行都可以分为物理和心灵两个层面。如果人只是在时空中运动,却不能引起思想的革命,那么,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。

马可·波罗的口述,七百年来,一直吸引着各种各样的读者。他所描绘的世界,对欧洲人来说,几乎是全新的。

他的著作表明这样一个观点: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,也无论他们在体质和文化方面有多大的差异,但是人同此心,心同理,有着相近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,可以相互理解,和睦相处,安居乐业。

所有这些,都是马可·波罗所做的不可替代的贡献。

马可·波罗一行回到威尼斯的那一年,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约翰·蒙特卡维诺,受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派遣,到达大都。由于他对教会的杰出贡献,在1307年7月,教皇任命蒙特卡维诺为大都的大主教和全东方的总主教。

大约在1321年,另一名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欧德里克,从印度来到中国,经过广州、泉州、福州、杭州等地,渡过长江、黄河,来到大都。三年以后,他经过甘肃、呼罗珊,返回威尼斯,也口述了一部游记。

1328年,蒙特卡维诺去世,大主教的职务一直缺席。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又派了包括马里诺里在内的使团来华,大约在1342年7月抵达大都,住了三年后,经过中国南方,沿海路返回。

稍后,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·拔图塔,受印度德里的摩诃末算端的派遣,来过中国。伊本·拔图塔虽有多次航海的经验,但是,在

他 1369 年去世以后，人们主要是将他作为一名陆路旅行家加以纪念的。

伊本·拔图塔去世两年以后，中国的云南诞生了一位著名的航海家马和。马和后来成为明朝永乐皇帝的亲信，被赐姓“郑”。郑和在 1405 到 1433 年间，奉命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，七次出使东南亚、南亚、地中海沿岸的国家，一直到达非洲东海岸。

无论中国人从东航海向西，还是欧洲人从西跋涉至东，都表明了东西方沟通、交流和理解的愿望，并且不畏艰险，进行了实践。

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对欧洲人在地理知识方面的影响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革命性的。

中世纪时，欧洲人关于世界的观念，是以《圣经》和神话而非自然地理为基础的。中世纪的地图经常把圣地和耶路撒冷作为世界的中心，画有伊甸园、天堂的四条河流、邪恶巨人的领地等等，把陆地和海洋上未知的国家，想象为充满了恐怖与危险的土地，或者干脆认为是一片黑暗。

但是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用一种非常真实的方式，清楚准确地传递了大量关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的信息。在它的影响下，西方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革，这表现在分别完成于 1351 年和 1375 年的美帝奇和加泰隆地图上。它们尝试抛弃圣经的说教，反映真实的地理状况。特别是加泰隆地图所描绘的中亚和中国的情形，与马可·波罗的口述，非常相近。

无庸讳言，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对后来者的影响，是多方面的。在这许多方面之中，最为重要的，也许是那源源不断的刺激力量。马可·波罗关于东方富庶繁华情形的描绘，开启了商人难填的欲望，激发了探险家丰富的想象。

克里斯托弗·哥伦布，就有一本马可·波罗的《寰宇记》。他反复阅读和研究了这部奇书，在书的空白处作满了笔记，相信向西航

行,也可以到达中国和印度。1492年,他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信,要航海到中国和印度。只是在不经意中,他误把美洲当成了东方。

这就是新大陆的发现。

三

要给马可·波罗作传,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

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年代,历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族谱牒而已。

马可·波罗以及他的父亲尼柯洛和叔叔马窦,只不过是雄心勃勃、志向远大的商业旅行者罢了。

正是寻求增加财富的动机,才促成了他们的东方之行。

但是,他们毕竟是商人。

中国二十五史的撰写者,常常是主张重农轻商、重义轻利的儒者。

你在中国当时的记载中,找不到马可·波罗的名字。

我们为他作传的主要依据,仍然是由马可·波罗口述、鲁斯梯谦笔录的《寰宇记》。

这部两人合作的著作,不仅在当时为大部分思想保守的人所嘲弄,而且也受到后来严肃研究者的不断质疑。许多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事物,在书中只字未提。蒙古帝系的世次,时有颠倒。一些历史事件的讲述,与史实不符。

争论由此展开。

怀疑论者对马可·波罗是否来过中国,持有保留的怀疑态度。支持者则说,年长日久,马可·波罗的记忆可能会出现错误,而且,鲁斯梯谦在笔录的时候,很有可能进行了渲染。还有一种可能,就

是原稿在流传过程中的部分遗失。因为，这部书至少有八十五种较早的手稿，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。

关于马可·波罗游历和口述的真实可靠性，赫伯特·弗兰克总结说：“不管怎样，在没有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马可·波罗书中关于中国的章节是取自其他的、也许是波斯的材料之前（马可·波罗使用了一些波斯的词汇），我们只好假定、并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的。”

即使如此，为马可·波罗作传仍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

首先，我们甚至不知道马可·波罗长得是一个什么样子。虽然我们能看到许多关于马可·波罗的画像和塑像，但是，他在生前从未有过画像。现存最早的马可·波罗的画像，是在他去世二百年以后，才创作出来的。

其次，关于马可·波罗的童年与晚年，我们也都模糊不清，无从知晓。

我们所能充分加以利用的，只是他本人亲自口述、由人记录的《寰宇记》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个在马可·波罗生前出版的著作的名字，被后来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所取代。事实上，倒是《寰宇记》更可依赖。因为，在顺序时而杂乱的口述中，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他个人情况的叙述。

我们无从知道，马可·波罗一行，在什么时间到了什么地方。我们也难以分辨，哪些地方，他亲自去过；另外一些地方的情况，是他从别人那里间接听来的。

我们所能做的，是根据他经过的路线、以及他所叙述的一些事件，进行谨慎的推测。

但是，推测正是历史学家的大忌。

也许，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有力的借口：从某种意义上

说,历史是不可以模拟和复制的,我们读到的,都不过是些经过了历史学家选择、提炼和加工的书籍,其中也自有撰写者主观的推测和目的。

更何况,这是一部史传文学的著作。

作为史传文学,既应该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,同时也允许对细节进行虚拟和渲染。当然,这种虚拟和渲染,应该是合情合理的。其实,早在古希腊的时候,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早已指出:

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,而在描述可能发生的事,即按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。诗人与历史家的差别,不在于诗人用韵文而历史家用散文……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记录已发生的事,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。

基于这样的考虑,笔者认为,史传文学是史与诗的结合。

因此,当我们尽最大努力,根据马可·波罗的口述,再现他们长途跋涉情景的时候,首先要理解他们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:渴望增加财富的主观动机,与蒙古帝国打通丝绸之路这一客观历史条件相结合,使得他们的旅行由可能变为现实。

当然,威尼斯的港口地位,以及威尼斯人远游经商的传统和经验,毫无疑问,也为他们的旅行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知识保障。

丝绸之路艰险的地理环境,各种气候条件,都是马可·波罗一行前进中重要的自然环境。

与人祸相比,天灾的威胁似应退居其次。战争与土匪,是他们遇到的最大威胁。

马可·波罗一行来到中国的时候,正是忽必烈统治下的大元帝国的鼎盛时期。但是,盛极必衰,到至元后期,蒙古帝国因穷兵黩武而分崩离析的迹象,已经开始显现出来。

来到中国以后，马可·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生活情况，因为在《游记》中没有提及，我们无从了解。

至于马可·波罗本人，到底在元朝政府中身居何职，《游记》中也没有明确的表示。所谓扬州总管的说法，在中国典籍中找不到任何根据。

不过，我们根据元朝的民族关系、忽必烈对外地风土人情的浓厚兴趣、以及马可·波罗自己的口述等诸方面，进行推测：马可·波罗很可能是忽必烈宫廷中一名很受赏识的侍卫。虽然他曾奉命出使过许多地方，但是，他生活交往的范围，经常接触的人物，大概不出狭小的上层社会。

以上是我们对马可·波罗旅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大致描述，以及他本人社会角色的定位。

因此，本书在尊重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，检讨马可·波罗的口述内容，去伪存真，按照历史顺序的先后，加以叙述，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，便于理解。

本书在此基础上，对某些细节进行了想象和虚构，努力使我们所了解的马可·波罗的形象，血肉丰满起来，以便再现这一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”。

应该加以强调的是，我们对于马可·波罗的理解，应该是历史的和实事求是的，不应该拔高，也不能贬低。作为探索者，他的动机并不总是纯洁的。我建议读者在阅读的时候，闻其言而观其行。因为，行为比语言更重要。

四

最后，作者再作以下几点说明：

第一，由于本人学识、能力以及时间等方面的原因，书中一定

存在不少错误和欠缺,敬请读者和专家指正。

第二,考虑到古代地理历史与现在有很大不同,特别是元时的一些人名、地名和历史情况,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非常陌生,书后特别附录了与本书内容有关的《大事年表》,以备读者在阅读时参考。

第三,本书在写作过程中,参阅了几种中文本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以及元史方面的著作。谨向有关译者和著者表示谢意。

最后,作者想要说的是,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,人类的探索越来越向宇宙中更远的空间延伸,从而提出了正确地理解我们已知世界的要求。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,乘坐宇宙飞船,到太空中探索未知的宇宙,毕竟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。

勇敢地探索未知的领域,和正确地理解天人的关系,对人类的生存而言,是同样重要的。